

论晚清资本原始积累路径的失误

杨华山 喻红丹

内容提要 资本原始积累的路径主要有两条：对内剥夺农民，对外对殖民地残酷掠夺或举借外债。晚清在早期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政策路径都出现了严重失误，从而导致早期现代化建设的失败与清帝国的败亡。

关键词 晚清 资本原始积累 路径 失误

晚清资本原始积累对内路径的颠倒

现代化的启动与实现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来说，这一漫长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每一个具体国家的现代化启动有早有晚，现代化建设有快有慢，但无一例外地都必须经历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资本原始积累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其现代化建设的最终成败。

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田园诗式的“正义”的“节俭”和“劳动”是财富积累的唯一手段。亚当·斯密认为，如果比较同一国国民的前代与后代，发现那里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出物，后代比前代多了，其土地耕作状况进步了，工业扩大了，繁盛了，商业推广了，“我们就可断言，在这两个时代间，这个国家的资本，必定增加了不少。那里一部分人们的节俭慎重所增加于资本的数额，一定是多于另一部分人们的妄为和政府的浪费所侵蚀于资本的数额”^①。其实，资本的积累绝不是“节俭慎重”所致，而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当然剩余价值不是从来就有的，所以就有一个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

所谓资本原始积累的对内路径是指在本国内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其中主要是指新型贵族、地主、资本家等对本国农民的劫掠与剥夺，如内源型现代化模式的英国是通过“圈地运动”完成的。从15世纪末开始大规模展开，到17世纪末加速进行，它促使了英国原来的封建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的转变，在英国农村出现了许多资本主义农场，这使农业的直接生产者农民与生产资料土地相

脱离，自耕农因圈地运动的发展而被逐渐消灭。“圈地使畜群肥，使穷人瘦。”一位名叫拉蒂默的传教士大声疾呼：“在许多农民前不久所居住的地方，现在只有一个牧人和他的犬了。”^②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成了被迫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市场。“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③

作为外源型现代化模式成功典型的日本，其资本原始积累对内的路径主要是通过地税改革而完成的。1873年日本政府公布《修正土地税条例》，1875年正式实施，1881年基本完成地税改革。改革后课税的标准是地价而不是过去的土地的收获量，“税率与丰收、欠(歉)收无关，以地价3%为定率”，并改实物地租为货币地租。^④税率之高和封建时代的年贡相仿佛，其理由“是当时的情况需要如此，即所谓‘际此多事之秋，以从前的岁入不足以维持现今的经费’。因此‘在修正土地税之初，首先应以减少从前的岁入为目的’。”^⑤通过地税改革，新地税在政府岁入中所占的比重极大，“在一个没有活力的农业和缺乏税率自主的国家里，巨大的军费负担和模范厂场的经费，以及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的扶养，都要依赖于田赋，这是自然的”^⑥。在日本，国家、商业高利贷资本家和地主共同掠夺农民，以农民作为早期现代化建设的牺牲品，故有学者认为，在日本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农村被置于“国内殖民地”的地位，这对于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

来说,确有其必然性。

可以看出,无论是内源型现代化模式的英国,还是外源型现代化模式的日本,其资本原始积累对内的路径都是通过对本国农民的剥夺而完成的,尽管剥夺的方式并不完全一致。与之相比,晚清的资本原始积累对内的路径却正好颠倒。

几千年来,中国以农立国,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政策未曾有过丝毫的动摇。贱商、商并不是因为某一朝代、某一皇帝的个人好恶,而是一贯的政策。汉高祖刘邦即位第二年即“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⑦,随后又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官仕吏”^⑧,还额外加重商人的税负,如汉初商人和奴隶的人头税比普通人加纳一倍。汉武帝更是以“算缗”、“告缗”无偿剥夺商人的财产。大清帝国开征厘金正是自古以来的贱商理念和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厘金制度的创办人雷以在咸丰四年(1853)奏报抽厘时引征古人“逐末者多,则厘以抑之”的话,并说:“捐厘之法,亦古人征末之微意。”^⑨类似为厘金辩护的理论在当时并非鲜见。“议者又谓厘卡病民,无异加赋,宜尽撤……民有四,农为本,商为末也。故病农之事不可行,行之则本先拨;病商之事尚可行,行之而未不伤。”^⑩

李鸿章被公认为洋务运动的巨擘,在近代世界史上亦颇享盛誉,甚至是与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相提并论的国际风云人物。但就是他,1865年在一封信中谈到厘金的重要性时说:“自古加赋则为苛虐,征商未为弊政。”^⑪在另一封信中他谈到“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田赋不足以养兵,“必须厘金济饷,与其病农,莫如病商,犹得古人重本抑末之义”^⑫。李鸿章看到列强猖獗,中国必须亟亟求富强,否则难以自立于世界,这一开放的眼光诚然可贵,但从他固守古人重本抑末的陈规旧俗这一层意义上来说,他与他所斥责的“庸妄人”并无本质的差别,同样不合时宜。

从资本原始积累的一般规律而言,其对内的途径主要是对农民的剥夺。清代中央的田赋征收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起执行“永不加赋”的政策,自此直到清帝逊位,在名义上中央政府所征取的田赋数变化甚微。

田赋基本不变,而人口却在严重膨胀,所以人均的税赋随着人口的增长反而呈下降的态势。因此难怪当时人说:“自我朝丁赋并完,取民之轻不徒千古所未有。”^⑬曾出使国外,识见颇广的黄遵宪也谈到,世人只见英俄法美等国富强,而不知其岁入租税至7000万镑之多,若中国岁入亦有此数,比今日常税骤增五六倍,中国亦可富强,但因岁入不足,内政外务能静而不能动,“谓非取之过轻之故

欤?”“上稽百姓以上,旁考四海以外,未有如我大清之轻赋者。”^⑭严复也说:“中国地大物博,税薄而民勤。”^⑮相对于清朝中央所得的田赋而言,清代赋轻之说并非无的放矢。当然,赋税之轻重并无绝对标准,而取决于诸如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家性质以及国民收入之多寡等综合因素,但更主要的是赋税的目的与用途。严复认为:“国家之赋其民,非为私也,亦以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而已,故赋无厚薄,唯其宜。”^⑯梁启超对此亦有相似的真知灼见。他说:“凡赋税于民者,苟为民作事,虽多不怨,今西国是也……苟不为民作事,虽轻亦怨矣。中国之税,至本朝而极轻矣……以轻税之故,乃至官俸亦不能厚,悉知官俸既薄,而彼百官者,仍取之于民之身,而其祸益烈矣?”^⑰为民做事虽多不怨,不为民做事虽轻亦怨,这话本身完全正确,但是否为民做事还有一个社会动员与宣传的问题。对于中国封建朝廷来说,没有通官民之邮的意识与传统,上下不通,交相失道,“国家加一赋税,虽出于甚正之途,甚亟之政,而民亦然以为厉己”^⑱。现代化绝不仅是政府或某阶层、某阶级的事,而需要整个社会的积极参与和奉献。

如果晚清农民所缴纳的赋税实数确与中央征取的数量相一致,那么农民的税赋的确很轻。然而,农民实际付出的总是超过了甚至大大超过了中央所得,这正是问题的症结与严重之处。当时有些人在谈到赋轻的同时,并未忽视这一现象。冯桂芬就说:“大抵田赋之数,民所出者二三,而国之所入者一;关税之数,民之所出者十,而国之所入者一。”^⑲严复也看到:“大抵中国赋税之事,尽于取下至多而纳之府库者寡。”^⑳如前文所述厘金的弊端之一相同,田赋被贪污中饱,“民出者多,国得者寡”^㉑。就连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洞悉此弊:“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㉒

各种浮收、贪污中饱,农民虚背赋轻之美名,而实担额外之重负。社会稳定时尚可应付,一遇灾变则较难支撑,而晚清社会又多灾多难,变故频仍,农民苦况可想而知。“地方官……每于近海之区,借防堵以派费,于征兵之境,借调发以索财,以及道路所经,辄以护送兵差,借给夫马为名,科敛无度。”^㉓宣统二年(1910),有人指出:“夫国中贫民,以农为唯一之职业。虽有永不加赋之祖训,而官吏相沿,巧设名目,十年以来,田赋之暗增于旧者,已不啻二三倍。故负担此赋之小农,前此仅足自给者,今则岁暖而号寒,丰年而啼饥矣。”^㉔近人的研究亦认为:“以正额而论,清末田赋甚至比明代还轻,但正额之外的各种浮收,以及漕役、劣生、刁监等的舞弊中饱,使清末农民的实负赋役繁重不堪。”^㉕

浮收附加中饱等等超出了田赋问题本身,涉及到财

政体制、税收制度的现代化问题,晚清朝廷在此方面显得无能为力。

为征收厘金辩护的人认为,厘金并不病商,因为商又加价于物,物售于民,最终负担者仍是买者。水涨船高,这诚然是事实。雷以 就说:“名为行铺捐厘,其实仍出自买客。”^⑥湖广总督官文也说过:“其实商贾已将厘金并入物价,特民间采买稍形昂贵耳。”^⑦薛福成同样认为:“所抽之厘仍加诸所售之货之价,则于商并无所损而其利实取之众人,所以积少成多,而民无大怨。”^⑧这些在表面上都符合逻辑。而且,鉴于中国以农立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其商品交易量的绝对数仍是可观的,特别是食盐等生活的必需品,不能不通过市场购买。厘金征于货物,出自买客,似乎主要是出自农民之手。厘金既然作为晚清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这应该暗合了对农民的掠夺。但是稍作深入探究,不难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首先,中国封建农业宗法自然经济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特点十分明显,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极少,购买力极其有限。其次,各类厘金之中主要是货厘,食盐虽为农民所必需,但盐厘占整个厘金比例平均不到 0.8%。^⑨米谷土产百货主要是在城镇消费,如果考虑到人口因素,厘金出自农民的相对数应该更少于城镇消费者。

何况,商品售价的提高总会 对货物的销路产生负面影响,而其不利于与洋货的竞争。尤其是现代企业创办以后,清廷并未忘记对新式企业的勒索。据统计,自 1884 年至 1911 年,轮船招商局、漠河金矿和电报局合计分别向清政府报效银达 1688400 两、1147101 两和 1293532~1491196 两。^⑩近代厂矿企业是日本政府极力扶持的目标,在中国却成为清政府“报效”勒索的对象。“与东京相比,北京完全缺乏实现一次社会的基本变化的必要洞察力。”^⑪名震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与外国资本家的蚕茧大战中,大清帝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作壁上观,坐视胡雪岩的失败破产,这是清廷漠视近代工商的典型案例之一。其实,只要清廷稍加援手,胡雪岩不至于落到那样的惨局。一定程度上说这实际上就是近代民族工商业命运的缩影。著名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郑观应以其切身的体验,认识到清政府“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⑫，“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⑬,感受切肤之痛,揭露入木三分。这一严重的政策颠倒是到底还是清廷的政权性质问题。

可能会有人以为,依靠对农民的剥夺来实现现代化是不道德的。但是,应该注意,道德评价绝不能够替代历史发展规律本身。“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⑭

如果以道德与罪恶而论,鸦片贸易丑恶无比,在斥责西方殖民者贩运鸦片来华时,似乎更应该检讨中国的鸦片消费者。晚清社会每年耗银几千万两吸食鸦片,“东亚病夫”并非空穴来风。这一巨额财富的耗费于人、于社会之有百弊而无一利人所共知,但它确实是被中国人消费掉的。如果将这每年吞云吐雾的几千万两白银移用于现代化建设,同样的负担,是否会产生异样的效果?

对清廷来说,现代化的启动时,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刚刚平息,因战争的破坏,急需恢复与重建,“田亩尽荒,钱漕难征”^⑮,原有的田赋有的还要蠲免减缓。清政府即使有意以剥夺农民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面对当时的情境,又是一个二难选择。更不幸的是,晚清社会的天灾人祸连绵。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阶段,正逢中国自然灾害多发频发期^⑯,这是迟滞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因素之一,更极大地加重了晚清政府的选择难度。

晚清资本原始积累对外路径的失误

除了对内的路径之外,资本原始积累还必须 有对外的路径,即对殖民地的野蛮掠夺或举借外债。

对于内源型现代化国家来说,对殖民地的残酷掠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 对外的典型路径,这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产业革命的发生的绝对不可缺少的因素。对爱尔兰、印度、北美殖民地的掠夺,海盗式抢劫,黑奴贸易,武力征服之下的商业“赢”利等等,这些殖民掠夺而来的巨额财富(这其中当然也有相当部分耗于争霸战争)使英国到工业革命发生时,已有了充足的资本用于非农业投资。18 世纪的英国对农业圈地、公路、桥梁、运河、公私建筑、磨坊和纺纱机的投资数量增加了。大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把剩余资金直接用于开发矿藏、修筑公路、开办工厂,或把余资存入银行,间接投资于工矿业。在对外掠夺和“贸易”中大发横财的海盗及商人是工业的重要投资者和贷款人。以印度为例,据估计,从 1757 年侵占孟加拉以后,到 1815 年止,英国从印度掠夺了将近 10 亿英镑的财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农民的大量存在和巨额的原始资本积累的有机结合终于在 18 世纪中叶触发了英国的产业革命的机关。英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化在量的积累上达到了向质的飞跃的临界点。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导致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从这里诞生。

在对外的路径上,日本的资本原始积累之初,在国内掠夺农民的同时,尽管它仍处于西方列强的奴役之中,但它却很早就开始了对亚洲近邻的殖民掠夺,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对外的殖民掠夺更是日本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源泉。由于资源贫乏、资本不足,明治政府刚成立就把对外扩张侵略作为其基本国策,将掠

夺朝鲜和中国等亚洲邻国作为其在西方列强霸权下丧失利权的一种补偿,即所谓“失之欧洲,取之亚洲”。1874年悍然入侵我国台湾,勒索50万两白银,吞并琉球,迈出了对外扩张的成功的第一步,初次尝到了甜头,自此胃口大开,欲壑难填。为了征服世界,明治政府狂妄地绘制了一幅对外侵略扩张的如意蓝图,经过“朝鲜——满洲——中国南部——美国——欧洲”五部曲,最后称霸世界。在这五部曲中,朝鲜和中国首当其冲。朝鲜距离日本最近,是侵略中国的绝好桥梁与跳板。对朝鲜的侵略为日本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曾起过巨大作用。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朝惨败告终,日本获得了对朝鲜的宗主权,向中国勒索白银2亿两(约合3亿日元),另有“赎辽费”3000万两,并霸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逼迫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并可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甲午战争不仅使日本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中国赔款成为日本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资本来源;而且,作为一个“蕞尔小夷”能够完胜大清帝国,其国际地位一跃而起,这又是一笔难以计量的无形资产。10年后的日俄一战,日本又战胜了老迈的帝国主义国家沙皇俄国,沙俄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统治权,将其在中国东北南部的利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并将库页岛南半部让与日本,以作为不向日本赔款的条件。这两次战争极大地推进了日本早期现代化的高速运转。甲午战争前,日本将主要精力放在军事工业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上,正是依靠巨额的甲午战争赔款,日本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经济现代化建设。1898~1907年间,日本国民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3%,增长最快的年份增长率达到23.3%。同期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为9.4%,增长最快年份的增长率达15.1%,最低年份也增长2.7%。这一速度在当时世界上名列前茅。纺织、缫丝、制糖和造纸等轻工业部门以及以国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部门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另外,甲午战争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加速实现,自1900年起,以“政商”资本为中心,急剧地实行资本集中。日俄战争前夕,在金融及主要工业部门,形成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四大财阀;日俄战争后,四大财阀发展成为现代财政资本垄断集团的大财阀体系。日本对殖民地的掠夺和英国对殖民地的掠夺于其资本原始积累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可以说,如果缺少了对朝鲜和中国的殖民掠夺,日本的资本原始积累不可能完成,其早期现代化当然也不可能顺利成功。

严格说来,晚清的资本原始积累似乎很难看出有明确的对外路径。它既无法与产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相比,也无法与面临类似被殖民命运的日本相比。

一般认为,晚清现代化启动时,基本上不具备殖民掠夺的国际条件。这种说法极欠缜密。大清帝国以天朝上

国自居,拥有对周边藩国的宗主权。藩国是一种变相的属国,晚清现代化启动时,清王朝与其宗藩关系仍在维系。但这与殖民与被殖民又有着性质的不同,清廷并不是从经济上掠夺藩属国,更多的是以藩国的所谓朝贡来满足天朝朝廷的徒有虚名的可怜的虚骄面子。至于向海外殖民,更是匪夷所思。薛福成在1893年写过一篇《论中国不勤远略之误》的小论文,不足千字,篇幅虽短,却极有识见,可惜未引起学界的注意。他说齐桓公的霸业是“势”,汉武帝的武功是“运”,唐太宗的威德是“权”,都不能算作“远”,即使元太祖“囊括俄罗斯,席卷五印度,余威震于欧罗巴,远则远矣,何尝非审乎机以奋厥武哉?”而今天环瀛五洲,近若户庭,通商万国,迺于几席,当任者尤当高瞻远瞩,恢张宏猷,“然后有以导其,持其变”。“数十年以来,中国不勤远略之名,闻于外洋各国,故其莫不欲夺我所不争,乘我所不备,于是事端百出。”薛福成在文末感叹道:“呜呼!时局之艰危甚矣,强邻之窥伺深矣。当事者漫不加察,苟图自便,玩岁时,犹偃然曰:‘不勤远略也。’此之谓无略,此之谓舍远而不知谋近,此之谓任天下事而不事事!”^⑦

薛福成病逝于1894年,假如他亲眼看到甲午战争、马关签约,不知他又要作出何等痛心疾首的感慨!用现代话语来说,“不勤远略”就是不事对外争强和扩张。固然不能将本国的强盛建立在他国的痛苦之上,但也不能因此而甘心以自己的屈辱奉呈他人的富强。身陷列强环伺霸权政治、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险恶国际环境,不进则退。满清朝廷委曲求全,妥协苟安,其结果如何自不待言。如果说晚清缺少对外殖民掠夺的条件,面对日本的成功,这一假设不攻自破。

此外,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对外路径也可以通过举借外债来实现。晚清外债举借虽早,却不是为了资本原始积累。^⑧从清廷本意来说,清政府并非情愿借债。甲午战败的巨额赔款,非大借外债无以筹措。尽管清廷财政极端竭蹶,但从对日赔款及归还洋债的情况看,清政府并非没有大借外债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财政能力。与其此时借债赔款,不如彼时借债建设。

综上所述,无论是内源型现代化国家,还是外源型现代化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途径主要不外是两条,即对内和对外。在对内上,二者都是通过对农村和农民的剥夺来实现的;在对外上,二者有较大区别,前者通过殖民掠夺完成,后者只能靠外债维持。

对资本原始积累的一般规律,因各个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启动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而其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状况更是各有差异,故对“一般规律”的反应并非刻板划一的范型,而体现出各自的特殊规律,即一般规律

的多样化。前文所述英国与日本的情况就有其本国的特殊规律。

从理论上来说,对于资本原始积累,只有遵循一般规律,才能较顺利地完 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反之则不能完成。但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不一定能顺理成章地实现现代化。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可以为工业化、经济现代化提供条件和前提,而工业化不等于现代化。如果只注重经济的现代化,忽略现代化系统工程中的政治、文化、教育尤其是人的现代化建设,则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将依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这已为历史反复证明,并为现实不断再现。

可见,晚清早期现代化的未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源于资本原始积累内外路径的舛谬。无论是对内路径的颠倒,还是对外路径的失误,则根源于政治。“政治上的失败乃是解释中国对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一个最重要原因。”^{③⑨}郑观应在写作《盛世危言》时指出,“穷究中外政治盛衰利弊有年,遂知我国之贫弱由于政治不良”^{④⑩},又说:“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④⑪}日本的福泽谕吉也说:“目前的政府即使出现如何伟大的人物,即使出现一百个李鸿章也无济于事。如要使人心更新、国家文明,除推翻中央政府一途之外恐别无良策。然而推翻政府之后,是否即能顺利地走向日本‘王政维新’之路,这是很难保证的。”^{④⑫}除了对李鸿章的评价略嫌夸大之外,这些分析可谓切中要害。清政府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缺误正当作如是观,而此后的中国历史的演变亦不幸被这一日本“文明开化”的先驱者所言中。

-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316 页。
 ②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22、12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61 页。
 ④ 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9 页。
 ⑤ 梶西光速等:《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23~24 页。
 ⑥ Norman, 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Meiji Period. New York, 1940, p. 142. 转引自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0 页。
 ⑦ 《史记·高祖本纪》。
 ⑧ 《史记·平准书》。
 ⑨ 《中国工商税收史资料选编》第八辑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8 页。
 ⑩ 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六,第 8 页。

- ⑪⑫《李鸿章全集》第 6 册,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290、3282 页。
 ⑬《时务报》第五册,第 7 页。
 ⑭《日本国志》卷一六,第 21 页。
 ⑮⑯⑰⑱《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892、915、912、915、916 页。
 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第 547~548 页。
 ⑳冯桂芬:《校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7 页。
 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〇,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18~19 页。
 ㉒《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1704 页。
 ㉓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301 页。
 ㉔王毓铨:《清末田赋与农民》,《食货》第三卷第五期,民国 25 年 2 月 1 日。
 ㉕《中国工商税收史资料选编》第八辑,下册,第 58 页。
 ㉖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23 页。
 ㉗⑲《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48、478~479 页。
 ㉘参见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下册,第 470~471 页表格。
 ㉙朱荫贵:《论晚清新式工商业对政府的报效》,《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
 ㉚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6 页。
 ㉛《盛世危言·商务二》,《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09 页。
 ㉜《商务叹》,《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70 页。
 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92 页。
 ㉞《李鸿章全集》第 6 册,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282 页。
 ㉟参见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夏明方《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清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
 ㊱参见杨华山《略论晚清内外债的发生及其任用》,载《贵州社会科学》2001 年第 4 期。
 ㊲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6 页。
 ㊳《盛世危言后编》卷四,“政治”,《郑观应集》下册,第 423 页。
 ㊴《盛世危言后编》自序,《郑观应集》下册,第 11 页。
 ㊵《福泽谕吉自传》,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229 页。

作者简介:杨华山,1965 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喻红丹,1969 年生,女,郟阳师专政史系讲师。

〔责任编辑:潘清〕

conomic position will help to raise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enterprises to deal with anti- dumping, which will be of help in changing the poor position of our country in international anti- dumping. Thus, we must study the difficulties in obtai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position, seek for the breakthrough to obtain it, and adopt effective measur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in the end.

(6) Historic Patterns of Administrative Personality

Zhang Kangzhi Yang Yan •87•

The administrative personality refers to the individual personality of administrators as well as the personality to tell the administrators from those of other social members and of other occupations, and it is the general personality all the administrators have. The administrative personality is in contact with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mode; the administrative personality in governing the administration is a kind of attached personality while the administrative personality in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is a kind of tool personality, and that in service administration is accompanied by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of the administrators.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is based on social history progress in post industrialization, and is an administrative personality being generating. In the system and institution design of service administration,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of the administrators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 The study of this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is of direct value for practice.

(7) Interpretation of Sense of Judiciary Authority

Ji Jinhua •114•

Judiciary authority is a concept with rich connotation and deep root, and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the field of legal sociology.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judiciary authority should focus on the comment and self- identity on the judiciary process and its result the social subjective concern, and expose the historic logic that the judiciary authority grows. Therefore, we should interpret the sense of judiciary authority from its basic features, connotation property and historic approaches.

(8) Mistakes on Routes for Capital Primitive Accumul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Yang Huashan Yu Hongdan •135•

There are mainly two routes for capital primitive accumulation: to exploit the peasants at home and to cruelly invade and colonize or loan on large scale abroad. In the early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ization in Qing Dynasty, serious mistakes occurred about the policy routes for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whether at home or abroad, therefore leading the failure of early construction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Qing Empire.

(9) Change of Publishing System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ture in New Period

Xie Gang •160•

In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literature, the publi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f adjustment, which the researchers should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In the new period especially since the mid- 80s in 20th century, the publishing system has changed a lot, such as the rise of native publication industry, the enhance of self- ownership, etc.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shing institution has brought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ture in China' s new period, pushing forwar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shing planning, changing literature on unprecedented scale and extent, forming colorful and complex literary phenomenon and scene.

(10) Division of Creditor' s Right, Knowledge Ownership and Real Right

Hu Lüyin •182•

The correct division of the creditor' s rights, the knowledge ownership and real right is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to construct modern civil law. The objective of the right should become the point to differentiate the right of civil affairs, but the objective of the right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abstract object and the concrete object so as to clearly differentiate the right and that the double objects of the civil right will not be mistake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Grasping this, there will not be difficulty in differentiating the civil right.